



《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
[日]村上春树 著
烨伊 译
磨铁 | 花城出版社

从《弃猫》入门， 看懂村上藏在小说中的心事

□烨伊

《弃猫》这本书和中国读者的距离,似乎很远,又似乎太近。这是一部村上春树回忆家族往事和个人成长经历的散文,村上的父亲曾经参与“二战”,其家族回忆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中日之间的那段历史,这也是本作甫一刊载于日本杂志《文艺春秋》便被诸多国内媒体及网友讨论的原因之一。因此说本书和中国读者的距离近,近在其写及这场令中国大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上;说本书和中国读者的距离远,远

在村上是以一个日本人的角度,阐述了集体记忆对一个家庭、一个个体的影响上。1979年,村上春树以其第一部长篇小说《且听风吟》获第二十二届日本群像新人奖出道。这个时间,正值日本战后从经济萧条转向高速发展,开始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立足于世界的阶段。高速运转的社会给都市人带来诸多精神与身体的磨难,探讨这种磨难下的丧失、孤独和空无感成了村上文学的发端。村上曾说,写作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一直以来,他的作品或以主人公通往异界的冒险旅程为线索展开,在情节推动下实现主人公心灵的疗愈;或通过日常生活中身体、美食或音乐带来的官能享受,来消解现代人的虚无与孤独。

但不容忽视的是,村上的长篇小说几乎无一例外会运用大量的隐喻,并相当多地提到了那场战争。1982年出版的《寻羊冒险记》中,村上便开始有意地追寻历史。1985年出版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他以寓言的方式描写一名“二战”老兵主动交出记忆和思想。1995年出版的《奇鸟行状录》更是明确地提到战后的责任与反思,2002年出版的《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塑造了老汉中田这样一个在“二战”期间离奇地丧失记忆,从而获得与猫对话的神秘能力之形象。2009年出版的《1Q84》中则借人物之口指出:“剥夺正确的历史,就是剥夺人格的一部分。”2016年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中提到,“二战”时期,画家雨田具彦的弟弟读大学时反复被征兵(读过《弃猫》后,你会发现这段经历和村上的父亲很像)。村上春树的世界里不仅仅有美食音乐和奇妙的探险,还暗含着他对历史的不断思考。源自家族的记忆使村上的创作中,有对人生如禅似的彻悟,也时刻在反对对历史责任与使命的承担。

村上在《弃猫》中写道,父亲去世后,足有五年时间,他抵触去调查父亲年轻时的经历,原因在于他担心父亲是否参加过南京之战。在父亲生前,他不愿直接向父亲打听这件事情,父亲也不愿向他提起,两个人就这样相互沉默着,直到父亲撒手人寰。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20年的今天,村上在《弃猫》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家族历史写在书中,展现给世人。抛开隐喻,也不以虚构的方式赋予登场人

“这是一篇简短的文字,究竟该让它以何种形式出版,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为它配上插画,单独出成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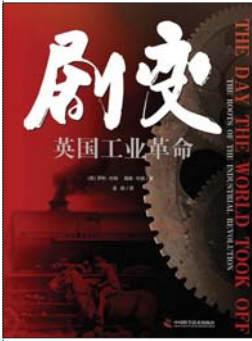
能够让作家村上春树考虑十年之久的作品,只有他与父亲之间的往事心结,在2008年父亲去世十余年后,70岁的他终于开始直面父亲波澜而又沉静生命,袒露了父子之间巨大沉默背后的缘由,2019年他以《弃猫》之名将这篇长文刊登面世,犹如掀开冰山一角,让外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村上。书名“弃猫”,指的既是父亲的成长经历,也是村上自己的童年记忆,或许也是历史带给许多平凡个体的感受。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村上在过去的作品中多次以不同形式涉及战争和中国主题。近日,中文版《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由磨铁推出,译者烨伊的翻译手记,可以视作是进入这本书的导读。

物或好或坏的结局,他只是坦白地书写,父亲的罪责,和自我的伤痛。本书的日版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这是一篇简短的文字,究竟该让它以何种形式出版,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为它配上插画,单独出成一册。”可见对于村上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之独特,无法合于其他作品之中。完成《弃猫》后,他在访谈中提到对这部作品的情感:“这一次,我拼了命将它写出来,作为一个写作之人的职责。”如果说,写作之于村上是一种疗愈,那么我想,通过这一次叙述,他终于以直面历史的方式,直面了这个纠缠自己半生的命题,化开了那根久久“哽在喉咙口的细刺”。对村上的老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意义非凡的一本;希望了解村上的新读者,也不妨从这本书向前回溯,从《弃猫》入门,或许会明白他藏在小说中更多的心事。

《弃猫》是年逾古稀的村上春树回望童年和家族历史的作品,大正、昭和、平成,历史年代不停更迭,夏日的海边潮声依旧。当野蛮生长于网络时代的我和我的同龄人读懂《挪威的森林》之中那纠缠的爱与孤独时,作者本人已经不再年轻。我们这一批读者不曾经历村上和其家族所经历的那些年代,历史却不会更改,更不容我们忘怀。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被看不见的过去影响着。

留学日本那一年,我兼职在当地的孔子学院教中文,主要授课对象是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在课上,一个老爷爷用夹生的中文这样做了自我介绍:“我,生中国,9岁回日本。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在私下成了朋友,慢慢知道他生于1936年的张家口,父母都是日本人,父亲那时做通讯工作,9岁那年,全家在中国百姓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被遣返回国。他一直保有对中文的兴趣,上世纪90年代特意到北京进修过一小段时间,趁机又去了一趟张家口。六十多岁的老人望见儿时记忆中的长城,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夹杂了太多复杂的情绪。我在日本的那一年,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始独居的第一年。许多个周末,他开车载我和我的留学小伙伴一起兜风,带我们体验当地的传统文化。他说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接受的来自中国人的善意,所以如今想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在当地留学的孩子们做些什么。聊天的时候,他多次提及自己生在中国,9岁回日本的事,但我们不约而同地没有深聊到那场战争。和村上写在书里的心情类似,有某种东西阻止了我向他发问。

比起集体的得失,这一代的我们更重视自身这个个体是否快乐。你我不曾亲历战争,宏大世界的瞬息变化却无一不牵动着每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村上在《弃猫》中将集体与个体比作“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和其中“寂寂无名的一滴”,大时代中,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历史,或许我们只存在于从雨滴掉落,到融入泥土的这个刹那,但刹那便是永恒。



新书秀场

《风雨横渡：英国、奴隶和美国革命》
[英]西蒙·沙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众多不知名的废奴主义者与黑人为解放奴隶而斗争的故事。他们认为,自由是属于全人类的权利,不因肤色有别。废奴者们在法庭上为遭人绑架的黑人慷慨陈词,带领他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北美战场,横渡风暴肆虐的大西洋,最终重返非洲故乡,在野蛮荒芜的塞拉利昂开创新的国度。蓄奴者的阻挠、革命者的虚伪、英国政府的干扰,甚至黑人同胞见利忘义的背叛行径,种种艰难险阻,都无法泯灭他们追求和捍卫自由的决心与勇气。

《李心田年谱》
元凤珍 张期鹏 薛凯洲 著
明天出版社

作家李心田因在小说《闪闪的红星》中塑造了儿童文学形象潘冬子,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潘冬子之父”。元凤珍、张期鹏、薛凯洲搜集了他生前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书籍以及大量手稿、信札、照片、影像资料、谈话记录,编写成这部长达19万字的年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先生专门题写书名,并撰写推荐语:“心田先生是儿童文学界影响深远的杰出作家。他以过人的勤奋和独有的才趣,给文学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作品。本年谱就像一部记录周备的三联单,将文事关节翔实存留,不再湮灭,头绪清晰且繁简得当,实为难得之勋劳。”

《山花对海树》
韩今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韩今谅的六则短篇小说,《小红花》《灰里焰》《倒春寒》《兰花草》《长生林》《推冰人》,如同一个个不知名的词牌,引出一阕阕浅吟低唱。六则短篇小说,六段市井生活,各种人生况味,用文学击碎时代滤镜,书写小人物的悲欢,直面真实的失意与伤痕,眼前的伤痛、身后的温暖,皆是生活与书中滋味。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热映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部分取材自本书的《小红花》一篇。

《剧变：英国工业革命》
[英]萨利·杜根 戴维·杜根 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谈到工业革命的起因,很多学者都会用人口因素以及关键时期的资源配置来解释,《剧变:英国工业革命》却将历史“倒过来”,从1830年的一天开始,当时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顶峰时期,故事不断延伸回溯至100年前、25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甚至1万年前,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全球历史,以探究技术进步的原因所在。

从群学到“中国经验”的社会学

□陈斌

1927年,当时还是一介学者的严景耀在对犯罪问题开展研究时,选择了一个颇为“疯狂”的举措:前往北京第一监狱当了一名“志愿‘犯人’,和犯人同住、同食、同生活”,并一呆就是三个月。此后又多次前往。

像这样特别注重社会实践,在上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鲜见。事实上,知识界的努力在上世纪上半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也确实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果。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建设成为动荡年代的少有亮色,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堪称经典之作。

万物皆史。作为一部探讨中国社会学发展变迁的学术著作,必然回到社会学的源头。社会学最先闯入国人眼帘,是动荡年代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筚路蓝缕,为落后国家寻找出路“上下求索”。可以说,一部中国社会学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寻路史。

在《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作者李培林看来,梁启超“堪称中国社会学的最重要创始人”,他“师承康有为,同时又深受严复和谭嗣同的影响。通过严复,他吸收了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思想,通过谭嗣同,他对《易经》的变通之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尽管有近邻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镜鉴,但社会学甫一在中国出现,就全盘摒弃照抄“西方现代化”的思路,而是注重从多个方面比如传统文化中吸收丰富的思想“营养”。

虽然对梁启超的“学术创始”地位极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
李培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其推崇,但李培林对梁启超的思想还是予以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其“重国家、群体,轻社会、个人”的思想,是其后来走向“保守主义”的重要根源。此外,李培林对学术研究方法亦有精辟论述,他指出,“社会学研究既需要有科学的分析方法,也需要基于经验的丰富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家不可能是一流的社会学家”。这里的想象力当然不是胡思乱想,前提是掌握一定的学术训练基础,然后基于多种知识提炼结晶后形成的逻辑自洽。

“东方现代化”是中国社会学绕不开的话题。一段时间,“西方”乃至“西方现代化”困扰中国知识界,日本的成功“脱亚”,难免会加重这一迷茫情绪。西方社会学自诞生后,长期以资本主义为关注研究中心,而中国本身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社会,绝大部分人口长期居住于农村。基于现实,像晏阳初、费孝通等人聚焦农村成为必然选择。国情的天壤之别,意味不可能用“西方”的鞋来套中国的脚。不过李培林同时认为,强调“东方现代性”的区别,并不是将“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实际上中国社会学意义下的“东方”,是兼具开放与包容等诸多特征。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有目共睹,但李培林对社会现实问题并不回避。本书中,李培林抛出了中国改革当前面临的五大问题,并对七个阶层争议问题逐一阐述,结尾还提醒要高度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极端主义。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社会学的前进方向所在。

与西方社会学注重先验性设计意义不同,中国社会学更像是摸着石头过河。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立下生死状,从而掀开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乃至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序幕。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把那些生活在经济趋势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我们的先头部队”,认为社会的未来就隐藏在他们其中。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学就像是寻找社会中的“先头部队”,即在社会中发现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现象,并通过政策引导,让星星之火燎原。